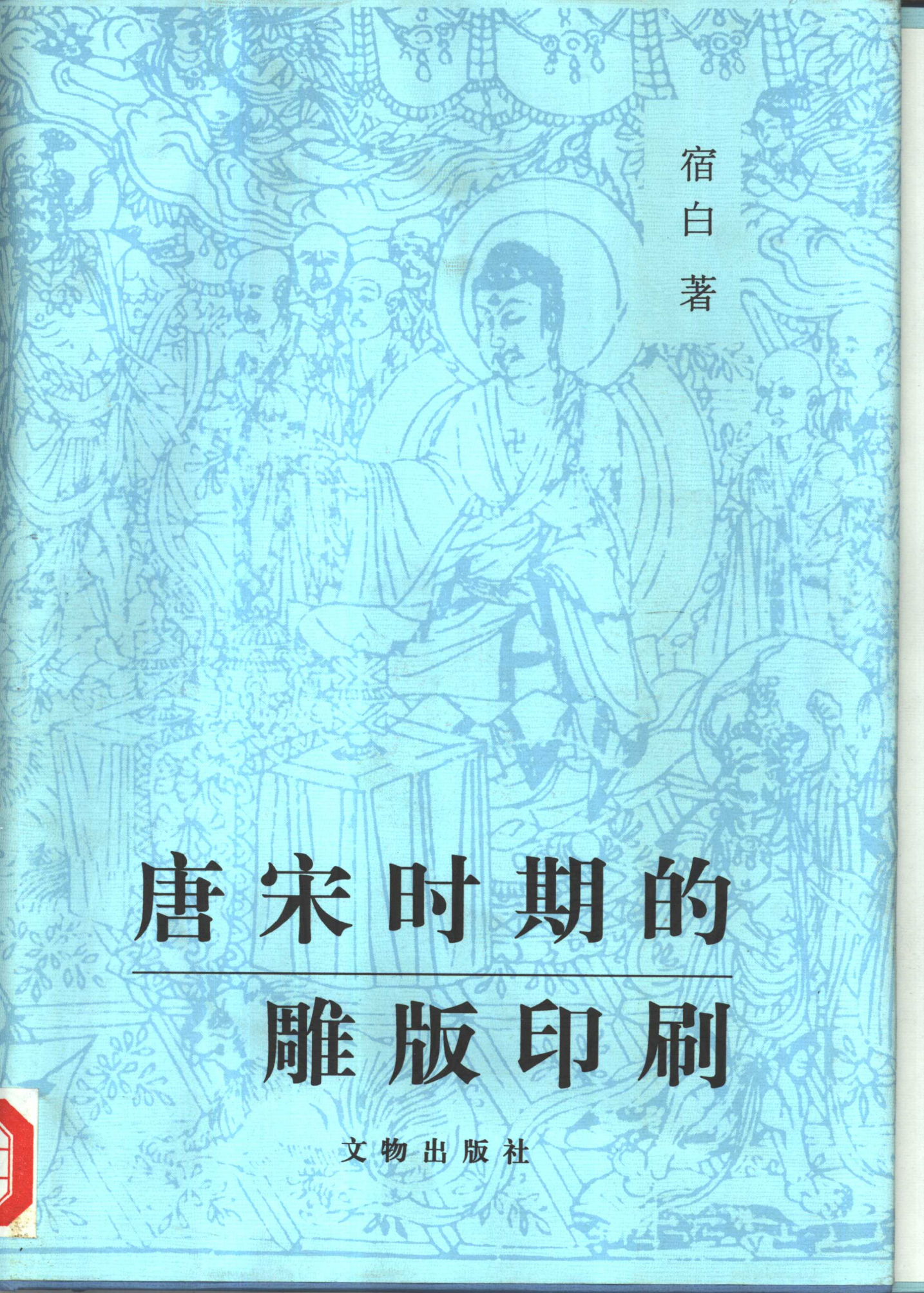




宿白 著

唐宋时期的 雕版印刷

文物出版社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宿白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编辑 蔡 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 宿白著 .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1999.3
ISBN 7-5010-1098-6

I. 唐… II. 宿… III. ①刻本 - 印刷 - 研究 - 中国 - 唐代②刻本 - 印刷 - 研究 - 中国 - 宋代 IV. TS8-0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6101 号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宿白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市朝阳区安泰印刷厂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3 月第一版 199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787 x 1092 16 开 印张 : 16.25

ISBN 7-5010-1098-6/k.440 定价 : 88 元

前 言

本集共辑论文五篇、附录两篇。论文的前四篇原拟收在拙著《中国历史考古论集》中，后因讨论雕版印刷的文字也可以不属历史考古学范畴，出版社的同志认为另册付印为好。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宋元史料目录》讲稿中的《南宋刻本书的激增和刊书地点的扩展》一节，排在《南宋的雕版印刷》之后，作为该文的补充。

附录一是1948年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参加撰写《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①时，我分担的部分任务。附录二是北京大学一百周年前夕，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张玉范同志商议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影》的草目^②。两篇附录记录了我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工作联系；40年代以来，为了学习、教学、科研，凡翻检中外文献，大半也唯北京大学图书馆是赖。饮水思源，谨以这几篇有关雕版印刷的重订稿，预贺即将到来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百年大庆。

1998年3月

①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准教授组织下，由赵万里、王重民两教授主持选编。参加书录撰写的还有冀淑英、朱福荣、常芝英、赵西华四先生。

② 这个草目和正式印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所收内容略有出入。

110.15/43.02

目 次

前 言

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	(1)
附 后记八则 ·····	(7)
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	(12)
附 现存释典以外的北宋刊印书籍的考察 ·····	(63)
北宋的版画·····	(72)
附 读李铸晋《评罗越：中国 10 世纪所刻〈御制秘藏诠〉 之木刻山水画》·····	(79)
南宋的雕版印刷·····	(84)
南宋刻本书的激增和刊书地点的扩展 ——限于四部目录书的著录 ·····	(105)
唐宋时期雕版印刷书影选辑·····	(111)
书影目次 ·····	(113)
书影图版 ·····	(117)
书影说明 ·····	(191)
附录一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日本善本书录·····	(203)
附录二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影选辑拟目·····	(212)
索引（书名、篇名、论文和印刷品名称）·····	(225)
后 记·····	(250)
英文目录·····	(251)

插图目次

南宋的雕版印刷

南宋主要雕印地点分布示意图····· (84/85)

元秘府本 (?)《清明上河图》中的书坊····· (89)

附录一

《唐翰林李太白文集》(朝鲜)····· (210)

《无文印》(日本)····· (210)

《重修人天眼目集》(日本)····· (211)

《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日本)····· (211)

附录二

《周礼疏》(宋刻)····· (219)

《史记集解》(北宋刻)····· (219)

《文选五臣注》(南宋初刻)····· (220)

《饮膳正要》(元刻)····· (220)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宋刻)····· (221)

《九僧诗》(毛抄)····· (221)

《说苑》(宋刻)····· (222)

《昼上人集》(钱穀抄本)····· (222)

《庶斋老学丛谈》(柳金抄本)····· (223)

《曝书亭集》(稿本)····· (223)

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

一、雕版印刷的开始和唐后期的雕版印刷

印刷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我国古代的印刷术开始于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的开始时期，以前有两种说法：一说在唐以前；一说在唐代。关于唐以前的说法，20年代向达先生《唐代刊书考》^①和50年代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②中的《印刷术起源》一章里，大体上已分辨明白，认为是不可靠的，这里就不详述了。唐代一说也还有分歧，张秀民主张开始于7世纪中期的贞观十年（636年）或稍迟。他是根据16世纪的著作——明邵经邦《弘简录》的记载，而《弘简录》的记载却未说明根据。明代人没有根据地说唐初的事，是不能轻易相信的。一般探讨雕版印刷起源的文章，大都从下面几条可靠的材料估计：

1. 《册府元龟》卷一六〇：“（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板。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太和九年即公元835年。据冯宿奏剑南两川及淮南道板印历日，最迟当开始于文宗太和九年；如玩味“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句，则印卖历日之始，似又在太和九年之前。

① 向达先生《唐代刊书考》原刊于1928年11月出版的《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1957年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② 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

2. 日本僧人《惠运律师书目录》中著录：“降三世十八会印子一卷。”印子即印本，惠运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归国，他所携归的印本《降三世十八会》的雕印时间，至迟也应在大中元年。

3. 范摅《云溪友议》卷下：“（纥干泉）镇江右……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范摅，咸通间人。纥干泉在大中元年（847年）迄三年（849年）时，任江西观察使^①，雕印数千本《刘弘传》的时期，应在847~849年间。

4. 敦煌所出咸通二年（861年）写本《新集备急灸经》（P. 2675）末书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说明此写本系据李家印本转录者。因此可知，京中东市李家印本的时间，不会迟于懿宗咸通二年，可能在咸通二年之前。又P. 2633写本《崔夫人要女文》末书：“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壹本。”此上都李家疑即京中李家。

5. 日本僧人宗叡《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著录：“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宗叡于咸通六年（865年）十一月归国，西川这两种印本应早于咸通六年十一月。

6. 敦煌所出有“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刊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②（《书影选辑》图版1，以下径作图版×）。

7. 司空图《一鸣集》卷九《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礪化募雕刻律疏印本共八百纸》：“今者以《日光旧疏》……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镌……。”向达先生考证司空图此文写在他第一次来洛阳期间，即懿宗咸通末迄僖宗乾符六年之间（873~879年）^③。司空文章中说是因“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镌”，可见在他写此文之前，《日光旧疏》已有印本了。

以上这七条材料的绝对年代，从835年迄879年之间，即在9世纪中期。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看到：

（一）当时地方官府和民间都已有雕版印刷了。

（二）印书的地点，除两京外，以长江流域为盛。从上游的剑南两川，到中游的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即今江西南昌），一直到下游以扬州为中心的淮南，都

① 参看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五，《唐方镇年表考证》卷下。

② 斯坦因窃去，现存伦敦，编号不详。

③ 向达《唐代刊书考》。

出现了雕版印刷。

（三）雕印的种类很多，有历日、医书、字书，还有道传（《刘弘传》）和佛书。

（四）印刷的数量发展很快，江西印《刘弘传》多达数千本，西川可以雕印有三十卷之多的《玉篇》。

（五）印刷的质量可以现存咸通九年（868年）《金刚经》为例，字体清晰、整齐，卷前还附有布局复杂、刻印精美的《释迦给孤独园说法》版画，反映了当时雕版印刷的高水平（图版1）。

从以上情况看，可以肯定印刷术不是开始于9世纪中期。9世纪中期它已经走过了一大段路途。对这一大段路途应当作如何估计？在这里，不能不提到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日本神护景云四年日本皇室雕印的《陀罗尼经》。该经雕、印都古拙、原始，应去雕版印刷开始时期不远。神护景云四年相当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即770年。当时日本的先进文明，特别是日本皇家所享有的文化，包括与佛教有关的文化，大都渊源于中土，雕印《陀罗尼经》当亦不例外。大历五年上距唐代盛世的开元天宝（713～755年）不远，开元天宝间是日本派遣遣唐使，汲取唐文明的最盛期。在这个时期以后不久，日本皇室开始雕印的颇为原始的印刷品——《陀罗尼经》，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推测唐代早期雕版印刷的参考呢？如果可以这样间接推论，那么唐代雕版印刷的开始时期，就有可能在唐玄宗时代^①。当然，这只是一个估计，真正科学地论断，还要寄希望于以后的发现。

9世纪70年代以后，有关雕版印刷的材料，以宋人《爱日斋丛钞》卷一引《柳玘家训序》最为重要：“中和三年癸丑（883年）……阅书于（蜀）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漫染不可尽晓。”看来印书的种类日益增多，成都雕印的发展日盛一日。敦煌还出有两个刊有僖宗纪元的印本残历：一个是中和二年（882年）历（翟理斯编号8100），首行刻“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图版5）；另一个是丁酉（乾符四年，877年）历（翟.8099），未记印地，但从刻风上看，估计也可能是成都的印本^②（图版4）。此外，敦煌还出有十多卷据“西川印出本”（P.2094）、“西川真印本”

① 参看 Carter, Thomas Francis,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Revised 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New York, 1955（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1957年）。

② 两残历皆为斯坦因窃去，现存伦敦。

(S. 5450)、“西川过家真印本”(北京图书馆有字 9 号, S. 5446、5451、5534、5544、5669、5965、6726, P. 2876、3398、3493) 传抄的《金刚经》, 抄写的时间从唐末昭宗天复二年(902 年)(S. 5965)到五代晋高祖天福八年(943 年)(P. 3493)。1944 年, 成都东门外的一座晚唐墓葬中出土印本《陀罗尼咒》, 上刊“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家□印卖咒本……”一行^①(图版 7c)。另外, 敦煌还出了一件佚失纪年的印本残历, 但保存有“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字样(翟. 8101)^②, 上都即长安, 这应是晚唐长安东市刁家所印的历日(图版 6)。“文革”期间, 西安西郊晚唐墓中也发现了和上述印本《陀罗尼咒》同样的东西^③, 大约也是当时长安的产品(图版 7b、d)。

以上是我们现知可靠的有关早期雕版印刷记录和已知的唐代实物的全部^④。从这些材料中, 可以看到从 9 世纪中期到 10 世纪开头, 在长安和成都的雕版印刷手工业中, 已专业化了的家庭手工业发展很快。就现存实物, 我们知道当时长安东市有李家、刁家, 成都有樊家、过家、卞家。樊、过两家开设的铺子, 不知在成都何处, 卞家则明记设在一般坊里, 不在市内。和其他手工业行业一样, 大城市里的市已限制不住它们, 它们已分散开设到市以外的居住区——坊里去了。这清楚地反映了我国晚唐时期城市手工业、商业的新发展。

二、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的发展

10 世纪前半段的五代十国时期, 虽然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 但在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上却很重要。重要之点有以下四项:

(一) 雕版印刷的地点, 除了过去的老地点外, 几乎遍及当时较为安定的地区,

① 该墓出土背铸“益”字的会昌中(841~846 年)所铸的开元通宝六枚。参看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 5 期。

② 此印本残历也被斯坦因窃去。参看 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7。

③ 此印本《陀罗尼咒》未著刊印地点。原件现藏西安市文管会。详见本文《后记》。

④ 本文第一节中选录的材料, 多据第 1 页注①、②向、张两先生著作。关于唐代实物, 敦煌还出一些未记刊年的印本佛教书籍, 其中可能还有唐代遗物。参看本页注②所引翟理斯目第五类印刷文书。另外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写经生字 7 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末有“弟子王发愿雕印”一行, 知此唐人写本也是据印本转录。参看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上辑。

如南方的吴越、北方的青州^①，甚至偏僻的河西也不例外。敦煌出有晋开运四年（947年）所雕的《观世音菩萨像》（图版8）（翟·8089）、《毗沙门天王像》（图版9）（翟·8093），还有天福十五年己酉（949～950年）雕版的《金刚经》（图版10）（P.4515，翟·8084）。这些印刷品都是当时割据瓜沙的曹元忠所刻。敦煌所出前两例，还是单张的印刷品，后一例《金刚经》则已是一本册子形式的书籍，可见当时敦煌雕版印刷的发展迅速。1971年，安徽无为的一座砖塔下，发现显德三年（956年）吴越国王钱弘俶刊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一卷^②。这种经，过去在浙江吴兴也曾发现过。从经前刊记知当时印造了八万四千卷。另外据张秀民统计，钱弘俶命灵隐寺僧人延寿在974年之前雕印其他佛教经像咒图有数字可考者，竟达六十八万二千卷^③，数量之巨，在雕版印刷史上是空前的，后来也是很少见的。这更有力地证明了吴越地区雕版印刷的急剧发展。

（二）上述敦煌发现的《毗沙门天王像》的刊记中表明“弟子……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观世音菩萨像》后刊有“匠人雷延美”一行。同一人在刻《观世音菩萨像》之后的一、二年内，又刻了《金刚经》，《金刚经》后面的刊记中雷延美出现了职衔，作“雕版押衙雷延美”。这三个刊记反映了：第一，当时河西地区有个体雕印工匠为官府所征雇；第二，由于官府雕版印刷的发展，有些工匠被官府录用，成为官府雕印手工业的管理者。这两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不仅也会存在，其规模可能更大。从上述吴越国王钱弘俶大量雕印佛教图籍，可以估计，那里征雇匠人的数字，当远远超过河西。在中原，《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记：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钞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四川私人雕印书籍也是如此。唐亡后的第二年（909年），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工开雕杜光庭《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毋昭裔于935年作了后蜀宰相之后，在成都雇工雕《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④。953年，他又“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

① 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王师范……执法不渝。其舅柴某酒醉杀美人张氏……柴竟伏法……至今青州犹印卖王公判事。”参看第1页注①、②。

② 参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简介》，《文物》1972年1期。

③ 参看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年12期。

④ 参看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65页及同页注④。

蜀主从之”（《通鉴》卷二九一后周广顺三年）。可见当时各地官府和官员私人雕印书籍都是依靠召募工匠。较大规模的雕印事业本身又培养了不少个体雕印手工业者。较多的个体雕印工匠的出现，无疑地便利了雕印技艺的传布。雕印手工业发展到五代十国时期，这些是不可忽视的新情况。

（三）开始雕印儒家经书^①。晚唐以来雕印手工业虽然发展很快，但直到10世纪初期，经书还是以传统的手抄本为上。前引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国子监开始刊印《九经》，儒家经书第一次出现了刊本。《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记载的长兴三年二月敕文中还说：“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刻）本，不能更使杂本交错。”这就更巩固了国子监印本经书的标准地位。关于长兴三年刊印经书，《册府元龟》卷六〇八记载较详：“周·田敏为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广顺三年六月，敏献印板书（《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册）。奏曰：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幸遇圣朝，克终盛事，播文德于有截，传世教以无穷。谨具陈。先是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闻。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经注……先经奏定，而后雕刻……。”^②当时，不仅雕印了《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还雕印了《论语》、《孝经》、《尔雅》，其后显德间（954～959年）还雕印了《经典释文》。由于后唐国子监雕印儒家经书的影响，953年，毋昭裔在四川也板印了《九经》。10世纪中期南北都在雕印经书，这样就彻底打破了文人蔑视印本书籍的传统。后唐以来国子监雕印经书，并规定以国子监印本经书为标准本，这样就出现了国家对雕印事业的控制。这种控制当然是雕印手工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后来为宋代所承袭。

（四）从《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所记长兴三年四月敕文中又知道：“国子监于诸色选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这是雕印书籍把书写和雕板这两个工序的人员明确分开的最早记录，而前此雕印实物字迹不甚规整，大约可以说明当时写、雕同出一人之手。这种分工，大大提高了印本书籍的

① 本节（三）、（四）两段选录的材料，多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该文收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3册。

② 《玉海》卷四三《景德群经漆板刊正四经》条：“《国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后唐诏儒臣田敏校九经，镂木于国子监。”《旧五代史·周书·冯道传》：“（后唐明宗时）以诸经舛缪，（道）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世赖之。”

质量，对确立印本书籍的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一直为以后的公私雕印手工业者所遵循。关于《五代会要》所记的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选定能书人的问题，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卷上曾辑录了不少记载，现重录赵明诚《金石录》和洪迈《容斋续笔》两项如下。《金石录》卷一〇著录：“《后唐汾阳王真堂记》，李悦撰，李鄂（鶚）正书，末帝清泰三年（936年）八月。”卷三〇又记：“右《后唐汾阳王真堂记》，李鶚书。鶚五代时仕至国子丞，《九经》印板多其所书。”《容斋续笔》卷一四周蜀九经条记：“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末云：大周广顺三年癸丑（953年）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嶠书……《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959年）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19世纪中期，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等发现日本室町时代（相当于我国元迄明初）覆刻南宋国子监递翻五代监本（半叶八行，行人十六字、小二十一字）的《尔雅》，卷末有“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鶚书”一行，更有了实物证据^①。五代国子监注意书写人，应是沿袭以前的石经制度。我国古代雕版印刷与石经发生关系，即是从五代国子监雕印经书开始的。它不仅以石经本为底本，而且也接受了以前刊刻石经的一些经验。

附 后 记 八 则

本文初刊于《文物》1981年5期。此次重刊未予改动。据近年新知的实物与文献资料，另撰后记八则如下。

一、新刊布的“文革”以来陕西西安、江苏镇江、安徽阜阳和无为唐墓中发现雕印的《陀罗尼咒经》计有六件，了解较清楚的有四件。

1. 196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站在西安西郊张家坡西安造纸网厂工地收集到唐墓出土的梵文《陀罗尼咒经》印本一纸（A）（图版7a），该纸原插入小铜管中，其他同出遗物不详^②。

2. 同在“文革”期间，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在阜阳一土坑唐墓中发现残存半幅

① 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二著录。此日本覆刻的《尔雅》，光绪末，杨守敬为黎庶昌购得，复刻入《古逸丛书》（图版13）。

② 参看安家瑶、冯孝堂《西安沣西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咒》，《考古》1998年5期。

的梵文《陀罗尼咒经》印本(B);同出遗物有白瓷碗、盘,碗饰四曲葵瓣^①。

3.1974年和1975年,西安市文管会分别在西安西郊西安柴油机厂和西安冶金机械厂征集到从土坑唐墓中出土的印本《陀罗尼咒经》各一件。前者系梵文印本(C)(图版7b),装于铜膊托内;同时收集到规矩四神镜一面,此镜是否与印本《陀罗尼咒经》同出一墓,不能肯定。后者咒经译汉,并在印本中心标题作“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D)(图版7d),该印本盛在小铜盒中^②。

以上四件印本《陀罗尼咒经》,只有阜阳印本伴出的遗物没有疑问。阜阳所出白瓷器与1944年四川成都土坑唐墓发现同印本《陀罗尼咒经》(图版7c)伴出的会昌开元通宝时间接近。看来,随葬《陀罗尼咒经》印本的蔚成风气,目前推定在中晚唐较为稳妥。至于四件《陀罗尼咒经》印本的时间顺序,经与成都所出《陀罗尼咒经》印本比较,似乎也可作些初步推测。A、B、C同为梵文印本,每件上下左右皆印梵文十三行,似属相同类型;但在内容安排上却有不同:A《咒经》外围印出单线边框,边框外墨绘一重供养的花朵、法器和手印;B《咒经》印本残存一半,其外围印出单线边框和框外一重花朵、法器(残存部分无手印)皆用墨笔绘出,俱与A同;C“《经咒》印文的四边,围以三重双线边框……其间布满莲花、花蕾、法器、手印、星座等图案”^③,皆是雕印出者。在《咒经》文字排列上:A作回式排印,《咒经》文字不能连接,边缘有模糊处,颇似由四块印板捺印者;B四面连续排印回,《咒经》文字可以连续环读,但四面接合处多有重叠,也似由四块印板捺印者;C印本残破,情况不甚明晰,似与B同。D汉文印本“环以经咒印文,每边十八行……咒文外围以双线边框……边框外……印有一周佛手印契,每边各有手印十二种”,《咒经》文字排列同B,即所谓“咒文环读”^④。至于成都唐墓所出《陀罗尼咒经》印本,文字为梵文,上下左右各印梵文十八行,在《咒经》印文外围的安排,所框一层双线及供奉形象俱为印出者,与D同;惟供奉形象似只菩萨与手印两种,颇与以上四件有较大差异。根据以上分析,表释上述五种《咒经》之异同如下:

① 承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同志见告。

② 参看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1987年。

③ 俱引自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

④ 同③。

项目异同 五种《咒经》	《咒经》印文部分			《咒经》印文外围部分	
	文字	每面行数	排列样式	层数与边线	内容与制法
A	梵文	13 行	回四面不衔接。似由四块印板捺印者	印出一重单线	墨绘花朵、法器、手印
B	梵文	13 行	回可以环读。似由四块印板捺印者	同 上	墨绘花朵、法器
C	梵文	13 行	排列同上，可以环读	印出三重双线	印出花朵、法器、手印、星座
成都印本	梵文	18 行	同 上	印出一重双线	印出菩萨、手印
D	汉文	18 行	同 上	印出一重双线	印出每边手印 12 种

如果可以按雕印梵文者在先，汉文在后；《咒经》文字不能连读的排列在先，可以连续环读的排列在后；外围框单线在先，双线在后；外围内容墨绘在先，雕印在后；外围形象较多的在先，只有一项手印者在后等现象考虑，那么 A→B→C→成都印本→D，在一般情况下，似乎即可视作这五种《陀罗尼咒经》的时间先后顺序。^①

二、王重民先生《伯希和劫经录》著录 P. 218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云：“有注，双行写。又有后序并赞三首。第三赞为范阳卢季珣撰。又有‘洛州巩县王大器重印’等语，则似依印本传写。”^②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记“开元元年（713 年）改洛州为河南府”，题记作洛州，如不是沿用旧称，这条记录可能是已知有关印本的最早文献了。

三、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中国石窟与密教》中记：“1985 年，在洛阳东郊史家湾砖厂出土了雕版印刷的《大随求陀罗尼》，长 0.38、宽 0.30 米。中心画一面八臂大随求菩萨……环绕大随求菩萨之外是八圈梵文，再外是方形七周梵文。在圆形与方形梵文的四角绘出四身供养人。在方形梵文的四个方位，中心画一坐佛，左右各有二个种子字，以金刚杵间隔之。四角画天王。在此陀罗尼右侧印有文字云：‘经云，佛告大梵天王，此《随求陀罗尼》过去九十九亿诸佛共同

① 另两件：安徽无为唐墓所出咒经，现藏合肥安徽省博物馆；江苏镇江唐墓所出藏镇江博物馆，1985 年 5 月曾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

② 《伯希和劫经录》收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 年。

宣说……岁在丙戌朱明之月初有八日报国寺僧知益发愿印施，布衣石弘广雕字。’其下墨书云：‘天成二年正月八日徐殷弟子依佛记’〔按天成二年是五代后唐明宗年号，公元927年（丁亥）〕，印刷的丙戌年即天成元年。”^①

四、《高昌残影——出口常顺藏吐鲁番出土的佛典断片四录》著录洛京雕印的《弥勒下生经》（图版12）。残片仅存该经最后一行经文的下部。此后印有“洛京朱家装印”、“洛京历日王家雕字记”两行。再后残存墨书尾题二行：“从悔奉为亡妣特印此经一百卷，伏（以下残）”、“□往净方面礼弥陀亲（以下残）”。据荣新江同志考证，这是后唐时期洛阳刊印历日的王家雕字，由另一朱家装印的《弥勒下生经》^②的残片。^③

五、后唐国子监刊印《九经》之前，曾刊《贞观政要》，见汪应辰《文定集》卷一〇《跋贞观政要》：“此书婺州公库所刻板也。予顷守婺，患此书脱误颇多，而无他本可以参板（校）。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国子监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则阙之，以俟他日闲暇寻访善本，且参以实录史书，庶几可读也。时蒙恩除知福唐，且有旨促行，穴（窘）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灯下书。”^④

六、显于后唐后晋的和凝，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卒于第，生前曾自刊文集。《旧五代史·周书·和凝传》记其事云：“（凝）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五代史记》卷五六《和凝传》：“凝……为文常以多为富，有集百余卷，尝自镂板以行于世，识者多非之。”）五代私家刻文集，见于著录者似只此一事。和凝又曾序《道》《德》二经，板行天下，事见《混元圣纪》卷九：“（天福）五年（940年）五月，赐张荐明号通玄先生，令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

七、后晋汴梁曾刊唐元度《九经字样》，见《直斋书录解題》卷三：“《九经字样》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诏唐元度撰，补张参之所不载，开成中上之……（振孙）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

① 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350~351页。

② 此经尾题有“面礼弥陀……”，似与经文矛盾，值得注意。

③ 参看荣新江《五代洛阳民间印刷业一瞥》，《文物天地》1997年5期。

④ 据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三年，946年）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

八、十国蜀、吴印板独多。前蜀有乾德五年（923年）雕板的《禅月集》，见该集县域后序云：“众请域編集（禅月大师贯休）前后所制歌诗文赞，日有见问，不暇枝梧，遂寻检藁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乃雕刻版印，题号《禅月集》……时大蜀乾德五年癸未岁十二月十五日序。”南唐有《绮庄集》，见《郡斋读书志》卷四中：“《刘绮庄歌诗》四卷，右唐四库书目有《绮庄集》十卷，今所余止四卷，诗三十二、启状四十四而已，惜其散落太半。其本乃南唐故物，纸墨甚精，后题曰：升元四年（940年）重题印其文云云。”^①

^① 据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袁州刻本。